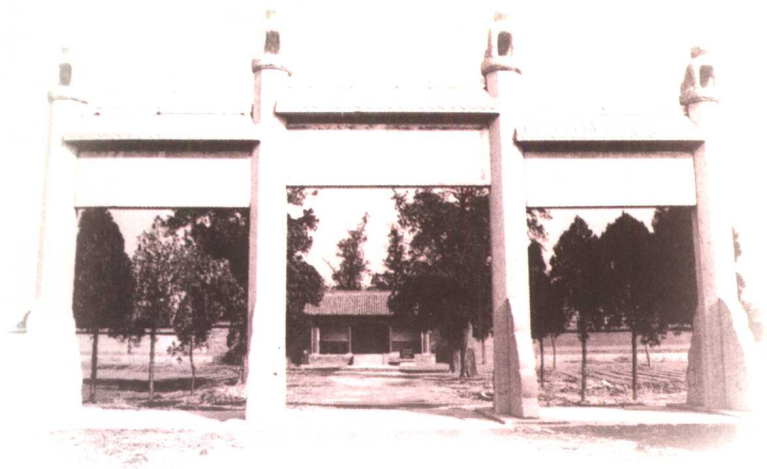


孔子文化论苑

儒家文献研究

黄怀信 李景明 主编



齊魯書社

【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

儒家文献研究

王仲文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孔子文化论苑 ■

儒家文献研究

黄怀信 李景明 主编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献研究/黄怀信,李景明主编.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12

ISBN 7-5333-1428-X

I. 儒… II. ①黄…②李… III. 儒家—文献—
专题研究—文集 IV.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1918 号

儒家文献研究

黄怀信 李景明 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625 印张 2 插页 37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428-X

B·186 定价: 35.00 元

序 言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编辑的三本论文集：《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中国儒学史研究》和《儒家文献研究》即将出版。这三本书构成系列，全面展示了孔子文化学院学科建设的丰硕成果。

在学术界，说起曲阜师范大学，大家会立即想到孔子及儒学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这所大学建立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更主要的理由是曲阜师范大学的领导和学者专家在这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从而受到海内外的广泛重视。

我和曲阜有特殊的缘分。1960年，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关头，我被下放到曲阜，住在因洙泗书院得名的书院村，曾有机会访问城西关外的曲阜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曲阜师范大学。那时我已经了解到，自这所学校始建以来，即有若干学者专注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在“文革”降临之前，学校作为这方面研究的一处中心，其地位业已奠定了。

“文革”浩劫结束，学术界拨乱反正，学校重得恢复和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孔子和儒学的研究工作，1979年创办了孔子研究室，1983年又扩充为孔子研究所，于这方面研究中独树一帜。经过20多年的建设，如今的孔子文化学院已足称人

所周知的重镇了。

孔子文化学院之所以能博得声誉，是与他们的持续努力工作分不开的。长期以来，学院各位学者撰著了大量书籍和论作，广泛涉及孔子与儒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这里无法详加介绍，读者从这三本论文集中不难见其一斑。我觉得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孔子文化学院为推动学科的前进，做了很多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记得在1981年，孔子研究刚刚走向高潮时，他们就编印了《孔子研究资料》。1984年，又连续出版了《孔门弟子研究资料》、《孔孟研究书目选编》和《孔子研究》论文集。后者共收录论文40篇，厚达500页，向学界同仁显示了队伍和实力。1986年，编著有《孔孟研究论文提要》。1991年，更为《孔子文化大全》编纂了内容丰富齐备的《孔子资料汇编》和《孔子弟子资料汇编》。这些重要作品，对学科的进展极有裨益，是关切孔子及儒学研究的人们不会忘记的。

看这三本论文集，我们可以了解到，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拥有一支成熟精干的梯队，正在已有的深厚积累之上，就孔子与儒学的研究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钻研探讨。许多文章提出了值得深思的创见，以及富有启示的问题。刘蔚华教授曾经指出：“孔子问题是我国历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而这种争论又往往同一定的社会现实相联系，使争论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真正属于‘纯学术’的争论从来没有成为这一领域中争论的主流。”所谓“文革”把这种非学术倾向发挥到了极至。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眼光研究孔子的时期才得以开始。孔子文化学院的这几本论文集，正是对孔子及儒学真正学术研究的成果。

这些年，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增高，中国传统文化，尤

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孔子和儒学，也日益受到更多外国学者的关注，这里不妨随手抽取两位汉学家的著作为例。

一本是美国学者白牧之和白妙子的《论语辨》(E. Bruce Brooks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白氏任教于马萨诸塞大学(埃姆赫斯特)，他在书中对《论语》作了详细的译注、分析和考证，199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印行。书的包页上，一开头就说：“没有人比孔子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更为巨大。他的学说作为中国伦理与社会体系的基础，长达两千多年；他的遗产，同一切属于中国的事物不可分离。”

另一本书是俄罗斯学者嵇辽拉的《孔子：生平、学说、命运》(L. S. Perelomov, Confucius: His Life, Teaching and Fate)，1993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俄文)。在这本书里，作者强调说明：“如大家普遍相信的，下一个世纪(二十一世纪)将是亚太地区的世纪。孔子的人的价值观，对这一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地区将继续起非常重大的作用。”

关于孔子和儒学的研究，无疑会继续拓展和深入。我确信，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事业即将日新又新，影响更为扩大。

李学勤

2004年12月14日

序言：建设完备的儒学研究基地

刘蔚华

借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出版研究论文集的时机，我想向读者介绍这个在国内外著名的儒学基地，作为我的序言。

曲阜师范大学创办于1955年，那正是我国教育大发展的年代。经过专家论证，当时的山东省政府认为山东高等教育的布局，有必要在大教育家孔子的故乡曲阜创办一所新型师范院校。筚路蓝缕，曲阜师范学院在第一年便建立起来。我是在1957年8月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所新学校任教的。一提到孔子和儒学研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在这所大学建设儒学基地的艰难历程。

曲阜师院的第一任院长是高赞非先生。当时省政府请他出任设立在孔子家乡的师范学院的院长，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在這裡建设起山东省的儒学研究基地。因为他是梁漱溟和熊十力的早期弟子，素来重视儒学研究。在1962年出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前，儒学研究的学术环境是相当宽松的。建院之初，他逢会必讲在曲阜设学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担负起在国内推动儒学研究的使命。当时的措施之一，就是把儒学的研究课题分配给社会科学各系来承担，并开始对曲阜儒家文化资源的系统调查，大量搜购和搜集儒家文献是

图书馆和各资料室的基本任务。还组织大学生全面抄录广布于曲阜的碑刻,参与孔府档案的研究与整理。日积月累,所集儒家文化资料十分可观。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儒学资料中心之一。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前身是1979年成立的孔子研究室。早在建校之初,曲阜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孔子研究会,组合力量,从事研究。“文革”结束后,适应当时的大好形势,曲阜师大希望在孔子、儒学研究上做出更大贡献,于是整合力量,成立了孔子研究室。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历程。

1983年,为了加强这里的儒学研究,当时的曲阜师院党委书记赵志浩同志又在孔子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孔子研究所,我被任命为第一任所长,并拨款购置了两套文渊阁版的《四库全书》,将其中一套留给新建的孔子研究所使用。现在的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这里集中了一批专门从事儒学原理、中国儒学史和整理儒家文献以及研究“三孔”文物古迹的学者,形成了以专业研究人员为中心,全校文、史、哲、政、经、教、艺等专业共同协作研究儒家文化的新格局。现任学校党委书记宋焕新同志接手学校领导工作后,大大扩展了学校的规模,学校师生员工已经接近三万人,并在日照海滨建起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的分校,使国内外来此研究和进修儒学的学者能够得到曲阜与日照环境的古典美与现代美的双重陶冶。

1985年,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曾献出青春年华的曲阜师院,被调到省里做社科院院长,但我并没有和曲阜师院脱钩,依然带了两届硕士研究生,直到1990年后我改任省社科联专职主席时才辞去导师职务。在漫长的33年中,我有幸参与了这所大学儒学基地的建设,并深知其中的艰辛和坎坷。但是,它终于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使这个儒学基地逐步完备起来，在儒学得以放开手研究的今日，多多发挥些作用。

文化研究基地的建设，一般存在着“道(理)、器、用”三个层次的工作，这样才是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文化研究基地。所谓道或理的层次，是指从思想、理论方面研究儒学，包括思想史的研究，儒学研究者大多不会忽略这个层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开掘深、见解新上看水平。在这方面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一贯是很重视的。所谓器的层面，主要是指文化的载体方面，如文献典籍、文化古迹、礼仪形制、儒家文化设施及儒风民俗等，也需要精心研究，进行必要的具有现代价值的开发。这方面曲阜师大也做了部分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如整理孔府档案、阙里文献、地方名物和探讨祭祀孔子的礼仪、乐舞、形制等，对进一步研究儒学和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所谓用的层面，主要是指发挥儒学研究对培育人才、美政美俗、敦厚社会风气、加强内外文化交流和开发旅游产品等的作用。这方面曲阜师大也做了许多工作。如培养研究生、进修生，召开儒学学术研讨会，同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儒家文化的学术交流等等。当然这三个层面的研究和开发，曲阜师大还正在不断加强。

当前新出版的这三本论文集，只是他们近几年研究工作部分成果的集结，也是一次小小的检阅。我深信在这个已经比较完备的儒学研究基地上，像不久前问世而颇有影响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之类的大成果，将会源源不断地推出来！

抚今忆昔说家常，展望未来寄希望——借以为序。

2004年10月6日

目 录

	序言一 / 李学勤
	序言二 / 刘蔚华
001	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及其所反 映的孔子精神 / 李启谦
011	《论语》首章与《孔子家语·屈节》篇 ——孔子政治命运悲剧的两个诠释 / 杨朝明
027	《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 / 黄立振
045	新世纪儒学经典文献研究的 任务及走向 / 黄怀信
060	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 / 杨朝明
078	《论语》郑义举隅 / 单承彬
092	释读《论语》之“和” / 修建军
105	“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校证 / 单承彬
113	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 陈东
132	《论语》中的道义主义快乐论 / 刘厚琴

- 139 关于黄侃《论语义疏》的整理与研究 / 陈东
- 158 《论语》的形上学研究 / 苗润田
- 172 《论语》校释举例 / 黄怀信
- 189 论《周易》中“时”的哲学 / 刘彬
- 200 读《尚书·虞夏书》札记 / 黄怀信
- 208 《逸周书·宝典》篇与儒家思想 / 杨朝明
- 221 《齐风》三诗《南山》《敝笱》《载驱》诗
旨新说 / 杨朝明
- 240 《礼运》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 / 杨朝明
- 262 《中庸》成书问题新探 / 杨朝明
- 283 《曾子天圆》与曾子的自然观 / 周海生
- 295 《曾子》源流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 张磊
- 317 《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 / 黄怀信
- 331 《孔丛子》与孔子世系 / 黄怀信
- 341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 孔德立
- 354 《小尔雅》的源流 / 黄怀信
- 381 读《孔子家语》札记 / 杨朝明
- 403 《孔子家语》成书问题考辨 / 孙海辉
- 423 《孔子家语·执轡》篇易学象数发微 / 刘彬
- 445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版本性质考辨 / 单承彬
- 463 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 / 陈东
- 479 上博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 / 杨朝明
- 486 从《诗论》看孔子是否“删诗” / 黄怀信
- 498 上博竹书《从政》篇与《子思子》 / 杨朝明
- 510 也谈郭店楚简引《书》问题 / 刘义峰
- 520 后记

关于“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 及其所反映的孔子精神

李启谦

一、问题的提出

《论语》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主要典籍，《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学而时习之”章又是第一篇的第一章，其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自然可知。因此，研究孔子和《论语》时，首先把这一章的言词语句和精神实质搞清楚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可惜的是，自古至今，很多人对这一章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该章共有三句话，即：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目前人们根据历代多数学者的注释译成的白话一般是：

孔子说：“学了后再时常（或按时）温习，不是也很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不恼怒，不也是个君子吗？”

我认为以上译成的白话很不恰当，因为如果这样理解这一章的

内容，从很多方面都是讲不通的。

第一，前后连贯的体例问题。一部《论语》共20篇，498章，每一章都是前后连贯地说明一个事、理。不仅六七个字一章的是如此，就是最长的有315个字的《先进》篇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是系统地记述同一件事。然而唯独第一篇第一章，三句话三个意思，前后互不连贯，前面说的是学了后再时常温习的问题，中间说的是来了朋友的问题，后面说的是别人不了解自己也不生气的问题，前、中、后三者的内容根本不接茬，这不符合《论语》的各章前后连贯的体例。

第二，开宗明义的要旨问题。绝大部分典籍或著作，往往在前言或第一章中，都要说明该书的主旨、要义或基本态度。儒家典籍如《大学》、《中庸》、《孟子》等等莫不如此，然而唯独《论语》第一篇的开头，不仅三句话三个意思，而且只是讲些生活问题，从中根本看不出它的主旨所在，也看不出孔子对其学说的基本态度。这是不符合开宗明义的惯例的。

第三，孔子对学习的态度问题。孔子是“敏而好学”、“学而不厌”的，但他从来不提倡死记硬背，而是鼓励人们在学习中去取得新体会和新收获。他称赞子贡学《诗》有新体会，“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又评论颜回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显然，“回也不愚”是因为颜回有新发挥、新发明。孔子曾强调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既要“温故”，又能“知新”，这才是“为师”的条件。与此同时，孔子对那些死念书本的人，是不欣赏的，他曾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所以，孔子对单纯地“温习”从来是不赞成和不欣赏的。

另外，孔子还格外重视“行”，他一再说要“敏于事，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对那些只会温习背诵而不能实际办事的人，不但不喜欢，反而认为是无用之才。如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那些只能背诵书本文字，而不能用于社会实际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

因此，要是说孔子学了后再温习一下就格外高兴，恐怕有失孔子的原意。因为学了以后再进行温习，这是常事，不一定有多么高兴。聪明人一学就懂，再叫他去按时温习，他就乏味。较笨的人去温习，很费力，也不会高兴。不用功的人，强迫他去温习，自然更无兴趣。总之，学了以后再温习一下是应当的，但如果没有新体会、新见解和新发现，只是温习再温习，当不会有多大的高兴可言。

由上情况可以看见，不论从哪个角度讲，目前通行的对“学而时习之”章的解释，都是不能成立的。

二、“学而时习之”章另解

怎样解释“学而时习之”章才合适呢？《齐鲁学刊》1986年第6期发表《“学而时习之”章新解》一文，曾提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新看法，但因该文短小，论述不充分，所以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下面参考该文的一些提法，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心得，提出一些认识，以供大家讨论。

我认为，这里的“学”不是动词，而是名词，指的是孔子

的“学说”。“时”不应解作“时常”或“按时”，而应解作“时代”（可引申为社会）。“习”不应作“温习”讲，而应作演习、采用讲。这样一来，全章的意思大体是：

孔子说：“如果我的学说被时（或社会）所采用，那不就太值得高兴了吗？[退一步说，如果时代没采用]，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不也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不但社会没采用，而且人们也不理解我的学说]，我也不恼怒，不也是位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

这样理解是否科学和恰当呢？是否有根据呢？请看下面的分析：

1. 符合前后连贯的体例。该章实际上说的是，孔子对其学说三种不同境遇的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最高兴；第二种也快乐；第三种不悲观不失望。这样看就和《论语》各章前后连贯的体例相一致了。

2. 符合首篇首章开宗明义的惯例。按照这一新解释，《论语》一开头就讲孔子对其学说的基本态度。首先要争取实现自己的理想；若退而求其次，则要得到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最后，若不被人知，也要抱定信念，不失君子的品格。这就和其他著作一样，也是一开头就宣明自己的观点和基本态度的。

3. 符合孔子的实际情况。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入世的人。他努力宣传自己的学说，而且很多弟子也给以称赞，他从中确曾得到快乐。可是他的学说没被各国接受，在鲁国受到排挤，在周游列国期间更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可是，在任何艰苦情况下，孔子都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坚持宣传自己的学说。这样看“学而时习之”章的三句话，也就是对其经历和对其不同境遇

所抱态度的真实写照。另外，这样理解也符合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一贯态度。

4. 文字训诂通顺。尽管前面说的合乎情理，但是如果文字训诂不通，这一新解释也不能成立。可是恰恰在训诂方面，能够完全讲得通。请看事实。

“学”字固然可以训为学习，但也可以解释为学问、学说、学派。《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这里的“学”，便是学说的意思。不仅道家的典籍中有这样的义项，儒家的文献中也有，如《大学》首章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里的“学”，也是学说之义。再进一步说，就是《论语》中也同样有之，如“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述而》）这里的“学”字，也是学问、学说之义。其实古人已看到了这一点，如毛奇龄在《四书改错》中就说：“学者，道术之总名。”程树德在《论语集释·学而上》按语中 also 说“学字系名辞”。如当名词讲，就是“学说”的意思。

“而”字，从来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讲法，其中有的训为“若”，如王引之训《诗·小雅·都人士》中的“垂带而厉”的“而”字时，就训为“若”。还有的训为“能”，如《庄子·逍遥游》“而徵一国”，郭庆藩就训“而”为“能”。

“时”字，固然可以作时常或按时讲，但是在先秦两汉的古籍中，作“时代”“时世”讲者也多有之。如《墨子·兼爱下》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这里的“时”就是时代的意思，“同时”就是同时代。《孟子·公孙丑下》：“彼一时，此一时也。”这里的“时”，与上同义。《楚辞·离骚》：“固时俗之流从今，又孰能无变化。”这里的“时”也是时代